

返本开新与文明互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

彭刚

核心阅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是“中华民族”的，又要是“现代”的。返本开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互鉴、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进而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是“中华民族”的，又要是“现代”的。前者要求我们返本开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后者则意味着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从不同文明中汲取养分，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中西互鉴。两者都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

返本开新，激活传统

返本开新是文明史上的常见情境，特别是现代大国强国的重要文化特征。世界变化越来越剧烈，我们都感受到了科技和商业的力量在深刻地改变社会，感受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越是这样，人们就越想回到自身历史和文明的源头，看看自己从哪儿来，想想自己的所来之处是否还有着能当下带来启示和活力的源泉。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我们更要去追寻那些有着恒定价值的东西。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人们不断回到先秦，回到我们文明的萌生处寻求启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先秦诸子一就是后世思想的灵感源泉。“三代想象”一直是儒家不断发展的依归所在。宋明理学更是中华文化返本开新的典范：面对佛学冲击，儒家士大夫从唐代韩愈、李翱首倡重建儒学，再到宋代朱熹重返儒家经典提出理学，再到明代王阳明集宋明理学之大成，儒学立足自身，返本开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资源。而儒学中的今文经学特别是公羊学，则在晚清危亡时期再度兴起，为有志之士的改良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历史上，西方文明也很多次回到古典源头去寻找启示，开启新思想。哲学家、数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文艺复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萌生，可它最初却表现得像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活。19世纪的德国，很多文化巨匠也把目光重新投向古希腊。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就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

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当今的欧美也有很多人在有意识地激活古典概念来理解当下。而在法律体系中，大陆法系的一些基本制度，例如合同法的一些基本规则，仍然在延续两千年前的罗马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今天，我们有更好的条件、更强的自觉来挖掘、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要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社会的变革和挑战，以创造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化形态和思想成果。返本开新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和开放包容之间也并不冲突矛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必然是返回中华文明根本，不断开出新形态、新内容、新成果的过程。

文明互鉴，创新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在当今世界，文明互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西互鉴。要促进文明互鉴、中西互鉴，就要实现三个“超越”。

超越文明隔阂，交流互鉴从来都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古代中华文明不断借鉴其他文明发展自我。历史上中华文明通过吸纳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文明，推动形成宋明理学。20世纪以后，中国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现代文明中最精华的部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文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哲学家罗素说：“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就汲取了古代东方文明的营养。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指出：“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历史上，欧洲曾对中国充满兴趣，启蒙时代还曾出现过“中国热”。

超越文明冲突，交流互鉴实现创新超越。“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文明的相通相近，反映出超越时空的人心共性，使得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逐步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之间的多元和差异，为人们在交流互鉴中更深刻地认识自我、取长补短、创新超越提供了条件。比如，古希腊文化对逻辑思维的强调、对非实用真理的探索、对好奇心的鼓励、对渴求创新思维的我们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中华文明注重秩序与自由、责任与权利之间的平衡，为当代西方有识之士反思自身文明时所借镜。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强调征服和利用自然，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天人合一”“顺天应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文明的发展，既要返本开新，激活各自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开放包容，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文明交流互鉴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己，而是成为更好、更伟大的自己。

超越文明优越，摒弃以族群来区分文明野蛮的观念。中华文明历来就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和气度，不以族群来划分文明和野蛮、区分文化的优劣高下，而是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外部世界。越是繁荣强盛的时代，就越是如此。当前，人类需要超越文明等级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文明并不意味着征服和改造，而是尊重、欣赏、学习和成就他者。

然而直到今天，西方一些人依然秉持文明等级论，将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产生出来的价值体系看成“普世价值”，并制造出许多文明等级的二分法概念——民主/专制、自由/威权等，对于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动辄指责和干涉，甚至兵戈相向。这种不平等的文明观正是世界上许多矛盾与冲突的根源所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价值观念是文明最深层次的内核。在返本开新与文明互鉴特别是中西互鉴之中，我们对中国人的独特价值体系会有更清晰的认知，这一独特价值体系也是正在创造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价值追求。

在社会价值观上强调群体本位而非个体至上。中华文明坚持德性为本、群体本位，讲求义利之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人民至上、群体本位。西方现代文明奠基于个体至上的价值观，其经济、政治、社会等秩序的逻辑起点，都是为追逐自身利益的个体提供理论和制度依据。原子化的个体极致地满足自身欲望，在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给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给西方社会弱势群体和群体带来了深重灾难。

在发展观上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中华文明历来对资本的逐利特性保持高度警惕，“天下为公”的传统社会理想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契合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上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政治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上反对用金钱衡量一切、强调精神富足，等等。西方现代化是资本驱动的现代化。资本被视为塑造社会的

支配性权力。

在治理观上强调团结统一而非分化对立。中华文明的历史血脉从未中断。秦汉以来，反对国家分裂、维护国土完整成为中国人的政治底线，维护统一成为中华文明的政治自觉。主流政治力量、主流价值观念和主流思想文化的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当代中国在更高水平上发展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丰富多元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又使其生机勃勃。政治与宗教、地域、种族之间的分化乃至撕裂，是当代西方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生态观上强调天人合一而非征服自然。中华文明坚持“天人合一”“天人互益”，以“万物一体”“中和位育”的观念看待自然，以“道法自然”“顺天应时”的心态敬畏自然，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方式利用自然。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了优秀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于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气候等挑战具有重要价值。西方现代化以征服自然为目标。

在天下观上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非各自为战。中华文化主张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平等共处，对话协商、共建共享。这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体现。差不多400年以前，利玛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西方现代主流观念，将国际关系视为各个国家在世界上竞争有限资源的关系。

当代世界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新兴技术不断撼动既有伦理原则，霸权行径不断冲击世界和平，民粹主义不断撕裂社会结构，世界上不同力量之间的激烈博弈甚至带来战火，这让我们对于世界的前景充满担忧。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客观上说远比过去有更好的条件。人类最有创造力、进步最大、最有活力的时候，也常常是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之间相互交流、交融最充分的时候。古老的传统重新焕发出活力，现代文明不断反思自身的欠缺，正是人类不断进步、走向更高更好的文明形态的机会。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返本开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互鉴、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进而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也是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必然选择。

(作者为清华大学副校长)



需要和可能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对重要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重大问题时，强调“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在论述我国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时，强调“我们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和可能，做好我国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是统筹兼顾方法论的具体体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体现社会或个体对发展的内在需求与期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满足需要的过程。可能，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把握和发展趋势的预判，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积极作为。需要和可能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脱离可能的需要往往流于“空想”，不考虑需要的可能也会失去实质意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要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和谋划，立足当下、放眼长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既体现引领性和前瞻性，又注重务实性和可操作性，既不墨守成规、陈陈相因，也不主观臆想、好高骛远，从而使各项工作更加适应时代要求、符合发展规律、反映人民意愿。

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什么时候二者兼顾得好，事业开展就顺利，反之就会导致工作受阻、事业延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5%左右，就是兼顾了需要和可能，既考虑了促进就业增收、防范化解风险等需要，并与“十四五”规划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衔接，又考虑了经济增长潜力和支撑条件，体现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要求。当前，各地都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需要”，但各地又要考虑自身的“可能”。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区位条件等的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各地的“可能”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防止一哄而上、搞一种模式。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只有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才能把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有机统一起来，使各项工作既积极主动又扎实稳健。

从更宏阔的视野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有共性的也有个性的，有阶段性的也有长期性的，对此我们要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要深入把握我们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要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深刻把握我国发展所具有的优势，不断增强信心和底气，塑造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最大可能”。

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要求领导干部提高科学思维能力，坚持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贯通需要和可能，在设定目标、校准目标、实现目标中统一需要和可能，在检验成果、评价成果、共享成果中把握新的需要和可能。在这一过程中，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至关重要。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掌握需要和可能的第一手资料，分析二者内在的实质及辩证关系，对影响需要和可能的内外部因素保持敏锐洞察，使各项工作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相协调。

立足本地特色和优势

为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担当作为

黄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扬长补短、固本兴新，努力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江西于都县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在此集结出发，踏上漫漫征途。近年来，于都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本地特色和优势，积极进取、主动作为，在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

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举措。改革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于都县结合自身实际，用好活用国家部委对口支援政策，大力推进深化改革开放专项行动，持续巩固提升商事制度、医养融合、体教融合等改革成果，聚焦农业生产“大托管”服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改革、文化旅游路径创新、国有企业改革、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等方面加大探索新模式、建立新机制。持续深化对内对外开放，积极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坚持“大湾区能做的，我们也要做到”的服务理念，深化“一站式集成审批”“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找准定位、明确方向，整合资源、精准发力。近年来，于都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全力强龙头、补链条、建集群，持续优存量、拓增量、扩总量，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推动纺织服装首位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实施技术创新和改造升级，建设智慧工厂、数字车间，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瞄准电子信息、新型建材、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重点发力，打造细分领域的特色优势产业。同时，我们充分用好红色资源，建设运营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于都段重点项目，做好建设提升、融合发

展、宣传推介、管理服务四篇文章，红色教育培训、红色研学、红色旅游蓬勃开展，文旅产业正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新动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于都县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重要位置，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进一步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深化产业、就业、易地搬迁帮扶，落实兜底保障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一体推进扩面种植、产品研发、标准编制、营销推广、品牌建设“五大行动”，大力发展富硒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努力在农村大地铺展开一幅气象新、面貌美、活力足、前景好的秀美画卷。

大力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确保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底线任务。于都县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用心用情办好“学位、床位、车位、厕位、梯位”等重点民生实事。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作者为中共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书记)



以强农兴农为己任

为农业强国建设贡献农业高校力量

张庆亮

性、战略性支撑。农业高校要发挥自身特色，大力培养建设农业强国所需要的的高素质人才。一是厚植学生的“三农”情怀。聚焦培养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将强农兴农责任担当融入思想道德、文化知识、社会实践教育各个环节，贯穿于学科体系、教学体系、管理体系建设中，教育引导青年学生立志为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二是优化培养体系。根据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需求，大力推进农林类紧缺专业人才培养；主动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求，优化农学类专业结构，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深入推进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聚焦创新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新要求，分类构建和完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涉农人才培养体系。三是创新培养模式。以能力建设为突破口，强化实践能力培养与锻炼，切实提高农林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强化专业、就业、创业、产业“四业融通”，注重招生、培养、就业一体联动，深化校地合作，着力提高人才培养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契合度。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农业高校要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在生物育种、装备研发、绿色农业、智慧农业等方面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争当农业科技创新先锋队、主力军。一是构建高质量创新体系。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多技术协同耦合、多领域有效整合的科技创新支撑体系。二是打造高能级支撑平台。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以重大需求为导向，依托各类科技创新平台、研发基地，推动优质资源共享、优势学科互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三是完善高效体制机制。坚持把实验做在田野里，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解决农业科技领域瓶颈问题的能力为标准，优化科研人员评价激励制度；健全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主动靠前为科研人员排忧解难、松绑减负、加油鼓劲，激发科研人员参与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

有效提升服务能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农业高校要进一步发挥教育、科技、智力等优势，有效提升服务能力。一方面，要让强农人才扎根乡村。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等群体，重点办好相关培训班，全面提升农民素质素养，培育好发展引领人、产业带头人、政策明白人，培养造就一批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的人才队伍。另一方面，要让兴农科技遍布田野。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培育良田、选育良种、研发良机、推广良法，推动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做大做强“土特产”文章，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优质的粮食、生产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

(作者为安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专题深思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也是新征程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要素。农业高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积极为农业强国建设贡献自身力量。

全力做好人才培养。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